

从探险与发现丛书



杨 陈
宏 宏
博 博
镰 镰

主编

WEI WANCHENG DE TANJI

追踪探险史上的经典瞬间
探索人类文化的深层内涵
揭示古代文明的重新发现

未完成的探险

德国

特林克勒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从探险与发现
书

陈 杨
宏 博
镰

主编

赵凤朝 / 译

未完成的探险

德国
特林克勒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完成的探险/(德)特林克勒著;张凤朝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3
(探险与发现丛书/杨镰,陈宏博主编)
ISBN 7-228-05661-2

I.未… II.①特…②张… III.游记—新疆 IV.K928.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3310 号

未完成的探险

德国 特林克勒著 赵凤朝 译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码	830001
印 刷	新疆昌吉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92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ISBN 7-228-05661-2/K·791

定价:13.00 元

2000.4.14

老古书店

最后一个“独行侠” (代序)

杨 镰

把 19~20 世纪的西域探险家称作“荒漠独行侠”，是个不够准确，但颇直观的比喻。如果可以暂借这个比喻，那么德国西域探险家艾米尔·特林克勒(Emil Trinkler)则是名副其实的最后一个“独行侠”。

在 20 世纪西域—中亚探险史上，影响最大的探险家是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他们可以并称为中亚探险的“二斯”。然而，有功力深湛的传统汉学—东方学作为后盾的德国探险家的中亚探险，是不能略过不提的。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前半期，在中国西部进出的外国人，主要属于瑞典和英、法、德、俄、日、美等七国。英、法、德、俄是当时的世界强国。亦如同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情况大致近似，在中亚探险活动中，德国也是力图“后来居上”，在中国西部集中投入了可观的人力和物力，其重点是在古迹密集的诸绿洲——库车、吐鲁番、和阗^①等地获取珍贵的文物。其中格伦威德尔、冯·勒柯克在库车、吐鲁番等地的作为，已为人们所尽知，而特林克勒

^① 和阗，在 50 年代中期改称和田。

在和阗以及塔里木西南的经历,则一直隐而不显。

20 世纪的西域探险家当中,进入塔里木最晚的特林克勒是相当重要的一人,也是一个在生前就引起争议,在身后“盖棺”而未能“论定”的人物。他于 1927 年进入新疆,在塔里木仅不足半年,1928 年 6 月被迫离境,3 年之后——1931 年就意外身亡。在生前,几乎没有留下评判他探险活动的功过得失的时间间隔;然而如果今天仍将其置于视野之外,那么 20 世纪的西域探险史就会出现“盲点”。

为此,借特林克勒惟一一部在中国西部探险的纪实之作《未完成的探险》(Im Lande der Sturme,又译作《狂飙之地》、《在风暴席卷的地区》)出版中文译本的机会,特对这个西域探险史上的最后一个“独行侠”略作探讨。

—

应该说,哪怕在关心中国西部的读者群中,艾米尔·特林克勒也是个陌生的名字。在此前出版的介绍西域探险家的著述,比如《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秘境西域的探险家》、《丝绸之路》(法·布尔努瓦著)等,不但没有为特林克勒列出专门的章节,连提到他的名字之处也十分罕见。以致在前些年出版的一本通俗读物中,竟将他作为两个不同的探险家(一个称为特林克勒,另一个称为椿克尔)来介绍。

不仅在中国,而且有证据表明哪怕在欧洲东方学界,学者们对特林克勒的中亚探险经历也不是都那么清楚。我们这样说的根据之一就是,1972 年出版了《斯文·赫定

中亚地图集》，这是将赫定本人半生所作的测绘和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①历时八年的实地测绘资料融为一集，并用美国资源卫星照片做参照绘制的一部图集。它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中国西部百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之一，受到国际学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就在这个大地图集的“和田”区域地图(NJ44)中，竟标示出了“特林克勒1932年”(Trinkler 1932)前往丹丹乌里克的路线。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特林克勒是1928年离开中亚的，而且在1931年就已经死去。

然而，西域探险史的实际情况是，如果“遗忘”了特林克勒其人，对外国人自行进入中亚探险这一历史的终结过程，对二三十年代之交塔里木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对西域探险史的一个重要区域——和阗的探险与发现，都有难以弥补的缺失。特林克勒进入塔里木的时间是1927年，这就使他成为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持续了数十年的“丝绸之路考古探险热”的殿军；他离去的1928年前后，是现代新疆的关键时期之一，是30年代长期内乱的发动期（或叫作潜伏期）。特林克勒不是第一个到和阗做考古探险的外国人，但他却是最后一个^②。所以对于和阗地区的探险考察来说，他的地

① 由于在1926年成立时，就明确定名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所以在本文中不称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② 在特林克勒之后，还有外国人进入和阗，比如瑞典科学家尼尔斯·安博特等，但他们都不是以考古探险或获得文物为基本目的的。

位是无可取代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年——20年代后期——那场与特林克勒本人有关的“风暴”早已平息,哪怕仅为了他是20世纪最后一个抵达丹丹乌里克的探险家这一点,也到了该认真谈谈与他有关的事情经过的时候了。

二

艾米尔·特林克勒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北方港口城市不莱梅人,出生于1896年。在西域探险家当中,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晚辈——1896年正是赫定初探罗布泊的年代。在学生时代,特林克勒就期望将来作为探险家,实地考察新疆、西藏,并为此学习了藏语、突厥语、俄语。在1923~1924年,他以在未开放的阿富汗做地理考察而知名。

到1926年,特林克勒又计划做一次新的探险考察,具体目标是:在西藏高原西部进行地形、地理研究;对克什米尔和塔里木盆地间的山脉做地质考察;在和阗的绿洲沙漠从事考古调查。这时德国的整体经济形势并不好,但德国人的心理状态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低谷中“浮出水面”,传统的对东方文明与古物的酷爱又开始抬头。各著名的博物馆和收藏家的需求促使文物市场再次繁荣。因此,在1927年这个不景气的年份,特林克勒竟从不莱梅市政府和德国科学研究应急机构获得了所需的资金。

如果推究西域探险家的动机,那么可以大致将他们

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个人立场——爱好、向往、追求、名利等等——出发的,另一种是为收藏单位搜集藏品。这只是大致的划分,并不科学,而且它们是互有交叉的,在有些时候,涉及的只是由谁出资这个实际问题。就第一种情况而言,最著名的就是瑞典人斯文·赫定;但德国的冯·勒柯克、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美国的华尔纳和安德鲁斯,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负有为博物馆搜集藏品这个任务而来中国西部做考古探险的。特林克勒的1927~1928年的西域之行,也与其相同。可以说,在中亚特林克勒是为德国不莱梅海外博物馆工作。资金就是这样争取到的。

特林克勒探险队的成员有:队长艾米尔·特林克勒,负责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队员赫尔穆特·德·特拉(Helmut de Terra),负责地质和史前史研究;瓦尔特·博斯哈德(Walter Bosshart),负责摄影,为考察发现物拍照,并在一定程度上担负后勤准备工作。特林克勒和德·特拉都是探险家、科学家;博斯哈德在参加探险队前是个成功的商人。事先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正是博斯哈德的商人“底子”,使探险队免于全军覆灭!

1927年4月23日,特林克勒乘船离开欧洲的安特卫普,开始新的中亚探险之旅,经印度孟买前往“世界屋脊”南侧的克什米尔,与德·特拉、博斯哈德在克什米尔的首府斯利那加会合。5月24日动身赴拉达克的列城,自此就处在了藏传佛教的文明圈之中。

在列城,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并搜集了民俗用品。这部如今已颇珍贵的电影拷贝保存在德国莱比锡地方志

研究所；回到德国，民俗搜集品就交给了不莱梅海外博物馆，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1927年8月3日，特林克勒探险队从列城出发，用两个月的时间，穿越了“世界屋脊”，走过漫长坎坷的无人区域。这一条路，就是自古从印度到中国的途径之一，也是人和牲畜的“死亡之路”。当他们精疲力竭地终于回到红尘，又见到人群时，却受阻于固玛（即今和田地区皮山县）。当地中国政权机构与之交涉时，发现他们的护照有问题。他们不得不前往新疆南部的首府喀什噶尔。问题暂获解决后，特林克勒急不可待地开始执行预定的计划。德·特拉独自到哈尔噶里克（即今叶城县）以南的昆仑山北麓考察地质，闻名的桑株岩画，就是在这个时期首次报导的。而特林克勒和博斯哈德则奔赴叶尔羌河西岸，他们曾驻足于斯文·赫定扎营的西玛扎塔格原始胡杨林；曾远赴玛拉巴什（即今巴楚县），力图找到伯希和发掘过的图木舒克早期佛教寺院，此行主要还是沿前人的足迹亦步亦趋。这初次“拉练”并不成功——没有找到地方，但他们考察了图木舒克附近的山梁和地形，总算不虚此行。1928年1月，特林克勒转赴和阗，把工作重点放到寻找古遗址和出土文物上来。

仅在赴和阗的路上，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在哈尔噶里克绿洲的边缘，首次见到了印度式的佛塔！但在固玛绿洲北部一个寄以期望的古遗址挖掘了两天，一无所得，使特林克勒颇感沮丧。

2月12~14日，在皮尔曼附近的另一个佛教寺院却

略有所获。

这一带就是赫定提到的“库姆拉巴特”——“沙漠里的王宫”；斯坦因所谓的“鼠壤坟”——鸽子塘。但对这个气势不凡的寺院，前人谁也没有投入这样大的精力。据特林克勒的发现，这儿在古于阗王国立国的十几个世纪里，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边境教区，香火鼎盛，供奉颇丰。可惜——可气——的是，有关皮尔曼的发掘，特林克勒文献里竟没有留下一点点文字记录：没有平面图，没有原始出土记录，没有发掘层位标示……作为考古作业，该有的全没有！即便当时按照规矩做了，也没有片纸只字流传至今。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皮尔曼—鸽子塘的遗址，对于认识古代于阗的拜物习俗、于阗亡国过程、于阗文明的来历与内涵……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1988年、1989年、1992年我在和田时，都曾听到民间传说，在皮尔曼一带陆续有文物出土，并亲眼见到一个佛像残片，是用石膏模塑，外敷金粉。无论它是佛的哪一个具体部位，这具塑像都要比真人大。而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对那儿做过发掘、考察的，仅有这个什么原始记录也没留下来的特林克勒！

70多年过去了，遗址、沙漠、寺院、文物……早已面目全非，许多有关于阗文明的隐秘也许是永远也弄明白了！

1928年2月19日，特林克勒一行抵达了和阗城（即今和田市）。像先行者杜特雷依、赫定、斯坦因等人，以及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每一个来和阗的外国人一样，特林克勒也从当地人或职业文物贩子手中收购了林林总

总、优劣不一、大多来历不明的古物。也像前辈探险家们一样,他绝不放过从民间收购这个渠道,但也绝不满足于仅仅是品评别人的运气,他要“小试牛刀”,非亲自实践不可。

3月3日,在圆城阿克苏皮勒(“白墙”)一无所获。他有点沉不住气了。他立即转赴著名的热瓦克寺院遗址。3月7日至4月4日在这气势恢宏的古庙挖掘了近一个月。其间他本人并没有一直待在发掘现场,3月中旬,他会合了博斯哈德,并一同抵达于阗王国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丹丹乌里克。3月22~25日,他们在丹丹乌里克进行了小规模发掘,所获颇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寺院群中一个有壁画的建筑,他们像同胞冯·勒柯克一样,肆无忌惮地从寺院揭取了所有有价值的壁画——这些壁画当然也归德国不莱梅海外博物馆。但在“二战”时盟军空袭期间,绝大多数毁于战火,只留下一组精美的照片为证。

离开丹丹乌里克,特林克勒自己又骑马考察了和阗河岸的著名名胜——玛札塔格。这是1928年4月2日的事。

到1928年4月4日,中国地方当局明令禁止特林克勒探险队在和阗再从事任何挖掘。6月,特林克勒、德·特拉、博斯哈德在喀什噶尔聚齐,再次申诉又被拒绝,所有攫获的文物均被官方扣压。特林克勒和德·特拉只得经昆仑山口回印度。仅留下博斯哈德做善后。1928年从6月到年底,博斯哈德发挥了商人的潜能,经过无数次谈判,时而怒目相向,时而握手言和;多为软磨硬泡,偶或

私相授受,把整个喀什噶尔政界搅得不得安宁。决定最终做出:这批文物一分为二,一部分“赠给”特林克勒探险队;一部分充公。而充公的大部分,又由博斯哈德私下向主管官员“赎回”。1928年12月5日,博斯哈德终于和数十箱文物一同首途,经苏俄回国。

而特林克勒一行1928年6月16日离开喀什噶尔,7月2日离开叶尔羌(即今莎车县),7月7日离开哈尔噶里克(即今叶城),走向昆仑山的克里阳河谷。8月17日中午,特林克勒的驮队进入列城的集市,回到了他们的出发点。

如果以列城作为起止点,那么特林克勒的中亚—西域探险一共历时一年零十余天,在新疆和阗,仅有4个多月。在19~20世纪的外国中亚探险家当中,这是一个相当短暂的时间。应该承认,他的理论准备和实际工作都不够充分,特别是与斯文·赫定、斯坦因相比。直到从玛扎塔格归来,特林克勒才弄明白,他们其实是“不受欢迎”的人,不但不能离开主要的驿路深入沙漠,而且不得随意拍照,更谈不上任意挖掘遗址了。所以,大致可以说,这是一次半途而废的、未能完成的考古探险。

尽管如此,特林克勒在地理、地质、民俗、考古……等方面所获不薄。回到欧洲,探险队成员就开始整理成果,以备发表。1929年初,经欧亚铁路运送回国的新疆文物和其他收集品,交付不莱梅海外博物馆。后来,文物分成了几份,主要的仍然保存在海外博物馆。而特林克勒本人一直紧张地工作,准备分批整理、发表学术报告。

应出版商之约,他先期写了一本通俗的探险考察记,

出版于1930年。也许是中亚的风沙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①,也许是他想曲折地表述对探险夭折的感受,他将自己这第一本书命名为IM LANDE DER STURME,直译就是“在风暴席卷的区域”——中文版名为《未完成的探险》。这本书先出版了德文版(莱比锡,1930年),马上就译成英文出版(伦敦,1931年)。就其一生而言,幸运的是,1928年的归途中,他奇迹般地在仆人枪械“走火”时幸免于难;不幸的是,1931年4月19日,竟死于一次车祸。除了这本《未完成的探险》,他生前只来得及写出计划写作的学术著作中的一种:《中亚西部及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地理考察》,这本书在他死后才问世(柏林,1932年)。

在19~20世纪的中亚—西域探险家当中,他即便不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也可以说是最不幸、最倒霉者之一。1894年,探访过和阗的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死于长江江源,采集品亦曾散失殆尽^②,但杜氏身后的名气要比特林克勒大得多。据我所知,在特林克勒死后,出版过一本纪念文集《特林克勒博士中亚考察科学成果》(柏林,1932年),一篇特林克勒本人所写的长文《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版地点不详,1939年),此后就是“二战”,他被“遗忘”理所当然。此外,尚有德国汉堡大学

① 他往返穿越的昆仑山,是一年四季强风劲吹;而在和阗时逢晚春初夏——三四月间的风季,所以他所经历的中亚,一直是为风暴席卷的。

② 杜氏死后,其搜集品收回了大部分。

格罗甫写的《中国新疆和阗考古发现——不莱梅海外博物馆的特林克勒收集品》(不莱梅,1974年)一书。这是一部全面评价特林克勒在和阗所做考古探险成就的专著,是研究特林克勒和20世纪西域探险史的重要著作。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为纪念特林克勒其人,不莱梅海外博物馆曾于战后的1951年公开展出了“特林克勒收集品”:文物和民俗物品。但无可弥补的损失是:有关和阗的考古探险,不但没有任何原始记录流传至今,连一份搜集品登记或目录都不存在了。

回国后,特林克勒、德·特拉、波斯哈德分别应邀写出了自己的探险考察见闻,但除特林克勒这本《未完成的探险》之外,都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所幸的是,摄影师德·特拉在1931年2月曾公开披露了自己为丹丹乌里克的寺院壁画所照的照片。由于这些精美的壁画原作大多毁于以后的空袭,所以德·特拉的相片就成了它们仅存的记录。

三

无论从特林克勒个人经历来说,还是从《未完成的探险》这本书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其与和阗考古探险有关的部分,而最有阅读趣味的则是描写从列城到塔里木绿洲一路情况的章节。在和阗的古老绿洲和遗址,特林克勒以敏锐的眼光记述了自己的见闻,这些见闻有些是独家的,有些至今仍具有启示性;在昆仑山古道的旅程,可以看成是一次“仿古”之行,读者能够通过他们的真实感受,

品味古往今来的经行者在这条“永远的路”上所承受的艰难困苦。

离开列城不久,探险队就进入了喀喇昆仑山脉的无人定居区域。而在昆仑山中,作者始终为一种征服感所左右。本书第四章“牦牛的末日”集中体现的就是这难以言传,只能意会的情感。为抵达途中有水草的栖息地——中国西藏的阿克赛钦,他们在1万英尺以上的高原跋涉,旅途“带来无尽的烦恼和忧伤”,但也有着“无穷的乐趣”。这是在最为艰险的路途中,在这一路上,红尘中的一切享受都会变成精神负载,最微不足道的困难,都会自行“放大”到极致。然而一次宿营时,作者却写道:“这个山谷向北展宽,进入一个广阔平原。在这儿,我第一次看到昆仑山脉,看到它那许多被雪覆盖的山峰。这是一个灿烂晴朗的秋日,如同前天一样。除此之外,我们太幸运了,有我们特别需用的东西——水、草地和柴火。”这里的“幸运”,只有一个探险家才能体会得出来。

同时,作者还曾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这条喀喇昆仑之路,是亚洲的忧伤之路,很多人和牲畜沿着这条路旅行,它为多少残骸负有责任呢? 10天来,人们惟一遇上的是卵石和光秃秃的岩石,轰鸣的山溪和蓝色的冰川。驮队的牲畜穿过荒凉地区之后,瘦极了,极度虚弱地到达了拉达克或中国新疆……这是一片残酷的土地,许多旅行者诅咒它。但同样,在那儿可以发现奇异的极其动人的景色,发现世界的另一部分。

多么具有诱惑力啊！亚洲的忧伤之路的确如此。沿着这个道路穿越，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和忧虑，但我们的思想皈依于你那宏伟的世界。在现代生活和欧洲文明的负重下，总有人想回到你那孤独和安宁的王国。

而我正是通过特林克勒对古道的认知，认识了不走运的探险家特林克勒。就是在这些段落里，我们才理解为什么古往今来人们会不辞辛苦地往返于如此艰险的旅途。

巡游于塔里木的古迹与绿洲，是特林克勒此行的目的。但对塔里木的了解与深入程度，他无法与赫定、斯坦因，甚至不能与另一支“失控的探险队”——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比肩。但不能不承认，就塔里木来说，很难再有像特林克勒这样目光敏锐的观察家，悟性这样高的“闯入者”。这些年我一直在陆陆续续写一本有关塔里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书，读了《未完成的探险》，我简直以为在读自己那本书“南河”章的初稿。当然，有特林克勒的记述，我那本书一定能写得更好，因为我的观察与思考，有了更广泛的依据。这就是我认为哪怕仅凭《未完成的探险》这本书，特林克勒这个探险家也不能被遗忘的原因之一！

特林克勒对和阗古今的观察与思考，对后人最有教益。这些内容集中在第十三章“沙漠的中心”。

他在洛浦以北的沙漠中，对著名的古寺热瓦克进行了挖掘。这个佛寺是1901年由斯坦因首次发掘的，斯坦

因可以说是西域探险家中最“专业”的一人，他对热瓦克的发掘相当彻底，发现物颇丰。但特林克勒一来到热瓦克就注意到，从1901年到1928年这二三十年间，和阗地区的风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近30年来，覆盖佛塔西面的沙已经漂移，结果部分西南墙现在已显露在沙上面，遍地是雕像的碎片”。由于在这个期间，和阗当地没有任何科学的气象观测，这个变化并没有引起关注。特林克勒不仅能捡到斯坦因的“漏”，还不经意地指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而1988年在一个重要的和阗遗址，1989年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的喀拉墩，我都曾独自观察到20世纪以来，塔里木确实发生了风向改变，事实上这就是“操纵”着和阗古迹隐显的原因之一。就我所知，这一情况是特林克勒于1928年首次提出的。

此外，关于热瓦克等佛寺是被大火焚毁的，而佛寺焚毁时佛像面部就被有意破坏；关于前往丹丹乌里克时见到的“和阗河”（而且河中尚有部分水^①）；关于玛扎塔格；关于皮尔曼的“鸽子塘”寺院；关于玛拉巴什（即今巴楚）胡杨林中最后的新疆虎……这些内容都是万万不能忽略的。

在全书的结论“本次探险的科学成果”中，特林克勒

① 现代的和田河并不流经自塔瓦库勒到丹丹乌里克的路上。这个记述相当有意思，是“南河”是否存在的证据之一。关于他所见到的河，他是这样说的：“和阗河河床里没什么水。”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他所路经的并不是一个干涸河床，而是一条水不多的河。